

本报记者岳德亮

营造红色氛围 夯实基层阵地

浙江绍兴扎实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俞燕燕是浙江省绍兴诸暨市“青年说”宣讲团成员。近几个月,俞燕燕的身影不时出现在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纪念馆、梁焕木纪念馆、何文隆事迹陈列馆、宣侠父纪念馆等宣讲场所,让更多的人了解诸暨市的“红色故事”。

绍兴市拥有2500多年的建城史,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尤其是百年来沉淀的丰富“红色文化”,承载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孕育出了独特的城市气质。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绍兴各地积极营造全民学党史氛围,用好基层文化阵地,创新形式讲好故事,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不断提升城市品质,助力乡村振兴。

分类指导实现广覆盖

分类指导,创新方法,是绍兴市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一大特色。

青年是希望、是未来。绍兴市将青年群体作为重点对象,掀起了党史学习教育的热潮。各团组织纷纷开展“书香共青团·季送好书”专题活动、“走进红色课堂学党史”专题培训等,动员绍兴团员青年利用“青年大学习”网上主题团课、“浙里潮音”互动学习产品等进行线上互动学习,累计参与学习人数达到186万余人。

绍兴民营企业发达。上虞区按照“党建强、发展强”标准,选择上市企业、产业链企业各10家,组建“凤凰领航”“红漫椒江”党史学习教育红色线路,以及“红湾宣讲团”等新组织宣讲队17支,不断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在诸暨市,当地结合珍珠特色产业积极挖掘直播人才,建立党支部,促进直播间党员的凝聚力。同时,建立“帮带制度”,目前15名直播头部党员各联系5个直播间,帮助其开户、引流、拓宽销售渠道、规范降低退换货率、提升销售量。

由老干部、老模范、老教师、老战士、老专家组成的柯桥区“五老”宣讲团,纷纷走进学校进行宣讲,成为一条独特风景线。绍兴市立足离退休干部工作实际,组建老兵志愿先锋队、开展老党员“声动越城”口述历史工作,为离退休干部学习党史搭建平台,创造条件。目前,约100名“最美老党员”活跃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尽力发挥余热。

夯实基层阵地“聚民心”

评话《智取威虎山·真假胡彪》、越剧折子戏《碧玉簪·送凤冠》、莲花落《核桃树下》、微党课《幸福唱出来》……6月10日晚上,越城区灵芝街道大树江社区文化广场上,“永远跟党走”——我们的节日专场晚会热闹开场,吸引了不少村民驻足观看。

农村文化礼堂是乡村文脉的重要载体,截至目前绍兴市累计建成文化礼堂1479家,党史学习教育的触角已更有效地延伸至基层角落,特别是以“越讲越响”理论宣讲品牌为引领,集成了“台门汇”“小柯开讲”“虞声嘹亮”“剡溪之声”“天姥云讲堂”等品牌宣讲团队,目前全市累计开展宣讲3000余场。

在新昌县澄潭街道梅渚村,村党总支和达音音像馆联合组织“音像中的百年巨变”观影学党史活动,以时间为脉络,以音像为载体,通过赏析经典电影片段和音乐重现百年来的红色历程。“作为一名农村党员,这样观影学党史的方式非常新颖,通过红色电影和红色歌曲重温党史,让我更深刻地意识到要将初心和使命融入具体工作中去,为乡村发展贡献一分子。”党员何春锋说。

线下宣讲百花齐放,线上宣讲也持续发力。方天是一名80后“绍兴评话”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今年,方天用绍兴评话改编了红色革命故事《红岩》,运用云直播的方式举办了多场宣讲会。“把红色经典、党的理论和评话相结合,让我的宣讲内容更加丰富,大家也更爱听。”

“加把劲”助力乡村振兴

挖土、放苗、培土、浇水……这几天,新昌县东茗乡王村迷你小番薯基地特别热闹,来自东茗乡政府的数十名机关干部正忙着在泥地里扦插迷你小番薯。

“作为基层干部,要多到番薯地里沾沾泥土气息,多到田间地头去工作。”东茗乡党委书记梁说,走访中了解到小番薯基地劳动力紧缺,乡里就安排了此次活动,助力东茗乡迷你番薯产业发展,推动机关干部转变工作作风。

东茗乡是一个典型的山区乡镇,村集体收入来源单一,农民主要靠种茶为生。今年以来,东茗乡积极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出台了迷你小番薯产业奖励政策,补助内容包括规模种植、示范基地、市场拓展、连片流转、技术培训五个方面,种植大户、家庭农场、企业等最高可获得10万元的政策奖励。

在嵊州市,23名35周岁以下年轻干部被选为“乡村振兴专员”,与23个村(社)结对,开展为期一年的派驻工作。一大批街道干部下沉到村、社区后,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如革命老区溪滩村利用红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推出了“我在红村有块田”等特色项目。

6月11日,绍兴市乡村振兴局揭牌仪式在市农业农村局举行,意味着绍兴“三农”工作重心开始转向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各项工作。

“我们将以成立乡村振兴局和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紧紧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振兴战略20字总方针,为绍兴加快实现‘四个率先’贡献‘三农’力量。”绍兴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说。

祖国夜空中闪亮的星

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大楼三层,一直保留着首任副所长郭永怀的办公室。

“郭永怀副所长办公室”里,保留着郭永怀生前使用过的纪念印章、计算尺、怀表,以及牺牲时留下的仅有的两件遗物——被火焰熏黑的眼镜片和手表。

郭永怀104周年诞辰那天,郭永怀夫人、语言学家李佩将陪伴自己几十年的物品全部捐给力学所,包括郭永怀牺牲时留下的眼镜片和手表。

郭永怀是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获得烈士称号的科学家。

1968年12月5日,在青海基地进行



核导弹试验的郭永怀搭乘飞机奔赴北京汇报工作,在着陆时飞机失事,不幸牺牲。

在飞机即将坠毁时,郭永怀和警卫员方东把装有试验数据的公文包紧紧抱在胸前,用生命守护祖国的最高机密和宝贵数据。

三周后,中国第一颗核导弹试验成功。那一天,也是中央追授他为烈士之日。

郭永怀1909年出生于山东荣成一个农民家庭,1938年与钱伟长、林家翘一起以相同的最高分数同时通过留学招生考试。

1940年,郭永怀一行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学习。次年,郭永怀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和钱学森一起师从世界气体力学大师冯·卡门。

郭永怀的夫人李佩后来回忆,学习之余,钱学森经常开着车,拉着郭永怀兜风。1945年郭永怀博士毕业,去康奈尔大学任

教,又是钱学森开着车将他送目的地。

新中国成立后,祖国在召唤。早一步归国的钱学森,在万象更新、百废待兴的祖国数次写信给这个同门师弟:“快来快来,我们拼命地欢迎你!”

1956年9月底,郭永怀携全家动身回国,立即全身心投入新中国建设。他长期主持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的工作,与钱伟长一起创办了清华大学力学教研室。

1958年,郭永怀参与创建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作为我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他在中科院力学所,在中科大,在九州,言传身教,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尖端科技人才。

20世纪50年代末,一批中国科学家突然“神秘消失”,时隔多年,人们才知道他们牺牲埋名投身于我国核武器研制。郭永怀就是其中一位。

1960年,郭永怀被任命为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负责我国核武器的研制。“两弹”研制所所在的青海基地,海拔3000多米,最低气温零下40摄氏度,生存环境极其恶劣。50多岁的郭永怀经常和其他科研人员一起,喝碱水、住帐篷、睡铁床。

郭永怀还同时参与领导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研制。由于长期从事绝密工作,和家人聚少离多,郭永怀年幼的女儿过生日时向他索要礼物,他只好满怀歉意地指着天上的星星说,以后天上会多一颗星星,那就是爸爸送你的礼物。

2018年7月,国际小行星中心正式将编号为212796号的小行星命名为“郭永怀星”。(记者王立彬)

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借调函背后的建筑奇迹

“最伟大的建筑物大半是社会的产物而不是个人的产物。”大文豪雨果曾这样说。

1958年10月的一天,教育部收到一封言辞恳切的函,请求协助借调44名高校师生。提出请求的,是当时主要负责城乡建设的原建筑工程部。函中写道:

“为迎接我国建国十周年,首都(北京)即将修建数座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十大)建筑物。目前在设计中对空气调节,电机设备,自动控制声、光、热以及建筑装饰等等均存在着若干科学技术问题,急需集中各方面力量加以解决……”

行文间一个“急”字,概括了当时的困难。

两个多月前,中央决定,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要在北京兴建大约十所上规模的公共建筑,“十大建筑”的名号就这么

定下了。

将满十岁的共和国生机勃勃。但豪情背后的挑战艰巨:离1959年国庆,只剩下不到400天时间。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一幅幅壮阔的建设画面在北京展开:梁思成、茅以升、张开济……全国顶尖的建筑专家云集;焊工、瓦工、木工……各地熟练的建设工程人齐聚;边设计、边准备、边施工,非常规的“三边”工作法应运而生。

“当时,周总理提出‘古今中外,一切精华、兼收并蓄、皆为我用’,迅速统一了设计思想。”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顾问总建筑师马国馨说。

倘若回到那时的天安门广场,你会看到:东边,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工地上,全国18个省市的1500多名工人前

来支援;西边,人民大会堂的位置,开工一个月就挖出30万立方米的土方。

向西,4000名解放军官兵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挥汗如雨。远眺东方,北京火车站的设备来自全国100多个工厂;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和工艺美术系的师生,正用自己从农村学来的花样装饰全国农业展览馆。

需要“借调”的又何止人才?建筑材料和设备,从各地夜以继日地向北京运送。原森林工业部调来上等木材,原铁道部拨出运输车皮;鞍钢提供优质钢材,云南、山东、广东、河北开凿大理石,杭州赶织锦缎;天津制造的电线,有北京到南京那么长……

这封借调函,正是“全国一盘棋”下,各地各部门共襄盛举的缩影。

一年不到,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和

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北京火车站、北京工人体育场、全国农业展览馆、钓鱼台国宾馆、北京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华侨大厦这“十大建筑”拔地而起,总面积相当于四个半故宫,被认为“创造了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

一个动人的插曲是,人民大会堂建成后,最先被邀请参观的,是一万名建设者代表和一些拆迁户代表。

“‘十大建筑’彰显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族自信。”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首席总建筑师邵平说。

60多年过去,许多先进、宏伟、精湛的建筑在北京竞相出现。

正如1959年国庆,参观完“十大建筑”的陈毅副总理献辞所言:“这仅是开端,伟大的工程还留在后面。”

(记者徐壮)新华社北京电

这个“小年轻”书记能干事

记贵州省普定县驻村第一书记王泽勇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贵州省普定县化处镇水井村驻村第一书记王泽勇(左二)在藕田边和村民们交流(2019年6月18日摄)。 新华社发

新华社贵阳电(记者李黔渝)“书记城里来,满身扶贫经。干得好不好,老少都知晓。要问亲不亲,胜似一家人。”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化处镇水井村,乡亲们质朴的山歌唱给驻村的第一书记王泽勇,句句见情。

35岁的王泽勇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选派的驻村干部,2016年4月起担任水井村第一书记。5年的驻村工作中,他强支部、兴产业,“果树上山、香葱进地、莲藕下田、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的产业发展路,让村民人均收入从2016年的4800多元增长到2020年的1万余元。

整村脱贫后的水井村,千亩荷花田,景色美如画。不仅吸引城里人来寻“乡愁”,邻近的村民也络绎不绝到访,带火了“乡村周边游”。

“为迎接7月‘荷花节’,今年我们规划出第一批90个摊位,当天就被村民们预定完了。”王泽勇说,盛花期有两个月,期间村民们摆摊卖些炸土豆等小食,每天最少都要赚两三百元,生意好的每天能赚上千元。

初到水井村时,这还是个体经济为零的“空壳村”。最让王泽勇头痛的是,产业发展过程中土地流转、项目建设等难推动,很多群众不支持,农村经营、善管理的人

才匮乏,影响产业发展。

“他刚来时,我这是个‘小年轻’,以为他是来乡下混工资的。”村民吴海和第一个在村里流转土地种莲藕,由于缺乏种植、销售经验,产业都快搞不下去了。王泽勇驻村后,上门找他四五次,吴海和才愿意坐下来和他聊产业。

经分析发现,前期种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农户种植面积小,产量少,大的批发商进不来,小摊小贩不愿意来,农产品出山成本高。

“他带着我们去外省考察学习,刚开始不管出去是几个人,还是十个人,他都垫钱请大家吃饭。我们以为他可以回单位报账,后来才晓得他都是自掏腰包。这让大家心里非常过意不去。”吴海和说,相处时间长了,发现这个人的确值得信任。莲藕大面积种植后,王泽勇带着他背着20多斤莲藕去深圳的超市推销,虽经历波折,最终还是成功签下订单。

为解决农村人才匮乏问题,王泽勇驻村以来,指导发展了5名党员,培养了6名年轻骨干加入村集体公司。大家在发展中认识到,壮大村集体经济“对我有好处”“和我有关系”。

依托中国航空工业“娘家”,“青岛帮扶

安顺”东西部扶贫协作等政策优势,王泽勇带领村“两委”班子积极争取各方支持。村集体公司里有了茶叶生产车间、藕粉加工厂等。全村发展莲藕1000亩,茶叶、因果林1200亩,四季香葱、萝卜等蔬菜800余亩,水井村的旅游收入达到150余万元,产业收益连续两年突破350万元。

洒下多少汗水,就收获多少真情。2018年原本两年驻村就结束,村民们集体按手印要求王泽勇留下来。王泽勇惦记妻儿,又放不下村里的产业,后来他把家人也接到村里和他一起驻村,又待了3年。

驻村5年来,王泽勇先后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全省脱贫攻坚优秀共产党员”等多项荣誉。6月上旬,他去北京领奖的消息传回村里,引发村民热议。记者和他在藕田边遇到许多村民,闲聊中大家表示了对他的肯定,村里老人评价他:“这个细心仔(小年轻)能干事。”

在王泽勇看来,今后更难的是守住这份荣誉,不辜负群众的期许和信任。他说,水井村仍处于起步阶段,他将一如既往地和全村百姓一起,为美丽乡村建设发展顽强拼搏,继续努力。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

电(记者毛伟、强力静、赵旭)因多次参与审定多位中国知名人士著作英译本以及多个中国政府文件英文版,来自英国的大卫·弗格森在中国为学界所熟知。

弗格森现担任外文出版社英文部高级英文编辑。2004年,弗格森有了新的身份——中国女婿,一段与中国的情缘也就此展开。

“2006年,我随妻子来到中国定居。第一次回妻子的老家吉林,见到了我的岳父李庆昌,感觉他非常亲切,当时不知道他还是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弗格森说。

弗格森回忆道,“一次聊天中,岳父知道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从那时起他便让我把他当作父亲。”

弗格森说,虽然岳父已经去世,但他仍常常想起这位中国“父亲”给他讲的许多故事。

“父亲出生于1935年,他与我有着相似的经历,很小的时候至亲就相继离开人世。他在北京无安身之所,白天以乞讨为生,晚上住在一个破道观里。后来,中国共产党救了他,还送他去学校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天,父亲只有14岁,他非常自豪地举着国旗在天安门广场游行。他认为那是非常珍贵的时刻,经常和我分享那段历史。”弗格森说。

上世纪50年代,李庆昌随筹备组到吉林省吉林市建设“新中国制糖厂”。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百余个大型项目之一。1952年7月,李庆昌加入中国共产党。

“往后的日子里,父亲刻苦学习,钻研制糖技术,成了厂里的骨干,担任过副经理和工会主席。”弗格森说。

弗格森表示,他很钦佩李庆昌的能力与毅力。“在工作上,他有股不怕苦、爱钻研的精神。在生活上,他是家庭的中心,很随和,帮助我很快融入新的家庭环境。”弗格森回忆说,“每次春节回到吉林,父亲都会耐心地教我打扑克、打麻将,通过各种中国传统游戏,让我更快与中国亲人们拉近距离,也帮助我提高了中文水平。我从他的处事上学到了很多,我非常怀念那段时光。”

弗格森告诉记者,正是与李庆昌多年的交往,让他真切感受到了与西方世界描述完全不同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魅力。

“近些年,很多不了解中国的朋友会问我有关中国或者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情况,我都会告诉他们真实的现状,并且会骄傲地告诉他们,我的‘父亲’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是我的榜样。”弗格森说。

英国女婿眼中的中共党员「父亲」